

从“旧材料”中“生出干系”

：重论鲁迅创作《补天》之意图所在

[新加坡]邹宇欣*

目 录

- 1、前言：《补天》的研究现状及本文问题的提出
- 2、从旧材料中生出新干系：一种重现的方式
- 3、结论

一、前言：《补天》的研究现状及本文问题的提出

鲁迅的《补天》最初以《不周山》为名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的北京《晨报四周年纪念增刊》上，并曾被收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中，直至一九三零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更名为《补天》，并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一月为鲁迅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在有关鲁迅创作的研究中，对《补天》的讨论称得上自成一家。这不仅是因为较之《故事新编》中的其他小说，《补天》撰写时间最早——是鲁迅尝试“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的“第一篇”；¹⁾ 同时也因为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着重提到了《补天》创作及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²⁾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1) 有关《补天》创作的初衷，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自言：“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见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353。

其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学对话乃至文化冲突等等议题无不引发论者的兴趣。两相齐下，使得这篇小说格外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补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首先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分析小说中女娲的形象及其背后的寓意。王瑶在《鲁迅〈故事新编〉散论》中说“作者歌颂了女娲，实际上也就是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和世界的伟大业绩”，“在《补天》中，这种对比尤其强烈：一方面是伟大的创造，另一方面是卑琐的破坏。”³⁾ 林非的《历史小说的开拓者——论〈补天〉及其他》肯定了小说“抒发一种巨大的创造精神”，“表现女娲在创造生命时的艰辛和喜悦，以及在炼石补天这个伟大劳作中的坚强毅力和献身精神”，同时他也指出成仿吾之所以唯独肯定《补天》正是因为其“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的特点”。⁴⁾ 这些论述的贡献在于肯定了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元素，不足之处是对文本的解读仅停留在一个表象的层次上，缺乏更为深入的内涵挖掘。因此，有关“鲁迅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问题也便具有了进一步的探讨价值。

这个问题的引发点在于，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言，《补天》的写作“是很认真的，虽然也只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⁵⁾ 而在另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又重提创作《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⁶⁾ 因此在讨论鲁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传承关系时，《补天》是一个不可避免文本。在这一问题上，值得关注的文献有陆耀东、唐达暉的《〈补天〉与弗洛伊德学说》⁷⁾ 以及吴立昌的《精神分析

2) 比如鲁迅在创作《补天》的中途停笔，因看见日报上登载的对于汪静之的《蕙的风》的批评而在小说中以“油滑”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穿戴古衣冠的小丈夫形象；其后成仿吾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补天》为佳作，间接“促使”鲁迅在《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将《补天》删除。见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页353。

3) 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载《鲁迅研究》1982年第6期。

4) 林非：〈历史小说的开拓者——论《补天》及其他〉，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5)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页353。

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页527。

7) 陆耀东、唐达暉：《〈补天〉与弗洛伊德学说》，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与中西文学》⁸⁾ 等。而在董学文、张首映的《从无意识到泛性论——弗洛伊德文艺观述评》一文中，论者也总结性地指出，鲁迅在创作《补天》时是“自觉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理论。⁹⁾ 不过余风高的《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印象》对《补天》“前后”两个部分¹⁰⁾ 创作主旨的不同进行了探讨，认为“通过《不周山》的创作来尝试应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不能贯穿始终，使鲁迅深感遗憾，觉得在文学创作中应用这一理论，与文学‘为人生’有根本性矛盾。”¹¹⁾ 而林非也认为，“总的来说，在《补天》中这种巨大欢乐劳作的气氛，占了压倒的优势。鲁迅通过这个宏伟的神话，反映了五四时期创造和开拓的精神，‘弗罗特’说的淡淡的痕迹，并没有产生支配作用。”¹²⁾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有关鲁迅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讨论只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这些分析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界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及心理学著作，由此引导一部分具有学术敏感性的学者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并带动一股风潮。

《补天》论述的第三个主要问题集中在鲁迅对创世神话的重述。这从另一个角度将文本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挥发，挖掘鲁迅如何赋予神话以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蕴。鲁迅本人称《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¹³⁾ 因此甘智钢在《神话与鲁迅小说——〈补天〉重读札记》中梳理了《补天》创作时的“契机”，指出“从1920年起，鲁迅陆续在北京几所大学主讲中国小说史，其时

学版)，1981年第3期。

8) 吴立昌：《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

9) 董学文、张首映：〈从无意识到泛性论——弗洛伊德文艺观述评〉，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0期。

10) 这里对《补天》前后两个部分的划分以鲁迅本人记叙的“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为分界线。

11) 余风高：〈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印象〉，载《鲁迅研究》，1983年第7辑。

12) 林非：〈历史小说的开拓者——论《补天》及其他〉，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13) 鲁迅：〈《自选集》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页469。

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中，“在这些学术著作中，鲁迅已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全部融汇其中，比如关于神话与小说的关系，鲁迅就认为，小说是源于神话的。”因此，“鲁迅因小说史的学术研究不得不研究神话，而当鲁迅研究神话时，他的诸多感想可能就会逸出小说史研究，并向其他领域涨溢，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率先用神话题材创作小说，与他对小说同神话渊源关系的学术认识是有紧密联系的。”¹⁴⁾ 那么以《补天》为研究对象，鲁迅是怎样从神话中吸取小说创作的养分呢？一类文论以印证的方式考证《补天》与原始文献记载之间的出入，目的在于考察鲁迅潜在的创作动机。比如秦林芳的《“无聊”与创作——〈补天〉新论》中以“女娲炼石补天的时间和原因”以及“女娲氏之肠”的诠释两处为分析重点，指出“作者的显在动机导致了对前文本的选择，而潜在动机则导致了对前文本的选择和重构。这种选择和重构使前文本展露出了全新的意义，这就是潜在动机在作品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所在。”进而言之，“《补天》及整个《呐喊》创作的显在动机是‘创造’和‘呐喊’，而潜在动机则是‘无聊’和‘寂寞’”，这是鲁迅“对生命的哲学思索”：生命就是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执着显在的现实创造行为中。”¹⁵⁾ 持类似观点的另有何希凡的《现代文化创造者忧思和豪兴的二重奏——鲁迅〈补天〉和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的情感内涵比较》，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指明“补天是成年鲁迅最深沉的苦闷的象征”。¹⁶⁾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类分析依然没有脱离先前有关弗洛伊德学说的讨论，纠结于鲁迅个人感官意识形态的论述反而暴露出研究视野上的狭隘。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弊端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一

14) 甘智钢：〈神话与鲁迅小说——《补天》重读札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页113。

15) 秦林芳：〈“无聊”与创造——《补天》新论〉，载《名作欣赏》，2000年第6期，页94-100。

16) 王富仁：〈创造者的苦闷的象征——析《补天》〉，辑于《文化与文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转引自与何希凡：〈现代文化创造者忧思和豪兴的二重奏——鲁迅《补天》和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的情感内涵比较〉，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页30-36。

定程度的弥补。它们从一个广大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作为时代背景的文学思潮是如何影响作家并反映在其创作中。这种论证方式更强调作家本身的自主能动性，也恰好回应了鲁迅一贯主张的人本思想。这一方面论述的代表，有吴颖的《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她从新文化启蒙运动人的解放角度，“以《补天》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的‘互补’作用为侧重点”，指出《补天》是围绕着立人思想的又一个艺术实践。“鲁迅着眼于古代人类的原生状态，创造了一个张扬的‘新的生命’意识及其创造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巨人的典型，一个会‘造人’又会‘补天’的中华民族的母亲式的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巨人典型。”¹⁷⁾ 同样将《补天》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考察的文章另有谭杰的《女娲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该文以《补天》和《女神之再生》为比较考察的对象，认为作品“都从女娲原型故事中抽绎出了最本质的精神取向，即创世记载中的创造意味，而创造精神正是五四时期革故鼎新的时代语境的典型标识，古老神话与时代话语的勾连，使得两位作家对神话原型的阐述具有了现代的意义。”¹⁸⁾

以上是有关《补天》研究的几个关注点，另有从女性意识角度审视小说中女性神话书写、¹⁹⁾ 从民俗图腾角度观照女娲形象出现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寓意²⁰⁾ 等论文，由于数量不多，在此不做赘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既有的论述能够为《补天》的研究画上完满的句号，相反地，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及视角的提出，这一领域又有了可资借鉴与拓展的空间。这种可能性源于当下研究大多对小说进行宏观式的考察，缺少文本细节的阅读（即使有，也略显分量不足），从而得出粗放式的结论。在这一思路启发下，笔者发现前文所涉及的不

17) 吴颖：〈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3期，页1-7。

18) 谭杰：〈女娲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2月，页77-81。

19) 见蔡婷：〈女性神话的书写——《补天》女性意识解读〉，载《语文学刊》，2009年第10期，页25-27。

20) 见闫宁：〈《补天》新解——民俗婚恋图腾关照下的女娲形象〉，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页58-61。

少论者都关注到了《补天》与《呐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创作之间的关系，²¹⁾ 尤其是有关弗洛伊德与浪漫主义的讨论实际上也不曾脱离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进而言之，更能够引起笔者思考的是邵建先生出版于2008年的专著《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²²⁾ 作者谈及了自己对于鲁迅在《孔乙己》发表时另作的一篇《附记》的认识。笔者先将《附记》摘录如下：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注：指《孔乙己》），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但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脏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在邵建看来，“鲁迅这个附记是‘多余’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写下这样一段“多余”的文字呢？尤其1923年8月《呐喊》由当时的新潮社出版时，鲁迅特意将《附记》删去了，直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时才将《附记》放在《孔乙己》的文本注释内。对此，邵建从《补天》的写作中找到了根由：因为鲁迅在批评别人藉由文学作品“泼脏水”的同时，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人身影射乃至攻击的路径。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够以“双重标准”来约束自我和他人的时候，迫不得已地删除了原本写就的《附记》。而这种以文字影射

21) 比如郑家建在《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一书中写道：“《补天》的写作时间是1922年11月，与《呐喊·自序》（12月3日）相差不远，从《呐喊·自序》中，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此时的创作心理：一方面，‘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活着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时自己的寂寞和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正是这种为新文化运动呐喊的热情，使得他以恢宏、瑰丽的笔墨，写出女娲创造的庄严美妙。”见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75。

22) 邵建：《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台北：秀威资讯，2008年）。

现实的“油滑”手法，正是从《故事新编》的首篇《补天》开始的。²³⁾那么，这一说法是否成立？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之一在于，邵建先生并没有以确凿的文本实例来证明，《补天》是如何以影射的方式对胡梦华等人进行反击，对文本的彻底脱离以及仅以《故事新编·序言》中的只言片语作为旁证显得立论有些不足。不过，笔者这样论断并不意味着是对邵建先生研究上的彻底否定，因为“影射”二字确实是重新讨论《补天》创作初衷的一个切入点。不同的是，小说到底在影射什么？是鲁迅一贯以来的睚眦必报？抑或是另有一番全新的解读？进而言之，笔者认同“影射”的一项重要依据是鲁迅在1921写下的《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1921年，也就是鲁迅创作《补天》的前一年，他翻译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并为此写了《译者附记》。同时，鲁迅也注意到了芥川“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

23) 对于这个问题，邵建的具体解释是：“读一读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编定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是可以见出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篇〈不周山〉（后改作〈补天〉），根据鲁迅的本意，是取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贯之以佛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然而，写作途中，从报上读到当时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文章——胡文对新近出版的汪静之《蕙的风》提出了‘含泪’的批评，鲁迅一则出之以文，即‘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进行反批评，一则在自己的〈补天〉中‘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故事新编·序言》，下引同）。此正三年前林琴南那人身影射的故伎在自己身上的重演。其所以如此，据鲁迅自述，当他看到胡梦华‘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时，‘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我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了。鲁迅的止不住，缘于他感到对方的‘阴险’，我的疑问是，鲁迅何以知道对方‘阴险’？不就是反对《蕙的风》吗？多大事？固然反的没道理，文章批评不就得了，何必用小说去矮化对方的人格？而况，‘阴险’云云，显是‘诛心’，对方不是把话都说明了吗。问题是，一旦被坐实为‘阴险’，那么，道义就在自己这一边，自己也就获得口诛笔伐外加人身攻击的理由或权力了。这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也就不难明白次年《呐喊》出版时，鲁迅为什么要删去那篇〈附记〉。然而，鲁迅自己对这篇小说也有所省觉：‘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也很不满。’鲁迅的不满在于小说作法，即油滑。我的不满恐怕更在于它以后的东西，因为，从鲁迅《故事新编》以后的作品看，他在人身影射乃至攻击的路径上似乎越走越远，远非油滑所能概括。用鲁迅批评林德话，这是小说创作的一条‘暗路’，结果自己也不幸走入，从〈补天〉开始。”见邵建：《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页364。

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人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²⁴⁾ 无独有偶，当他于《故事新编·序言》中追溯这一段创作经历时，也提到了集子中的小说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²⁵⁾ 据此推测，笔者有理由相信，鲁迅于1922年写下《补天》的方式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影响，想要从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人或物”，从而使古、今之间“生出干系”，也即邵建在论述中所提的“影射”。那么，《补天》到底在影射什么？这是一个待解的迷，也是本文将要考察的重点。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鲁迅是如何令古今材料之间发生“干系”的。进而言之，通过对这种潜在联系之间的解读，笔者想要对鲁迅创作《补天》的意图进行重新思考。

二、从旧材料中生出新干系：一种重现的方式

按照鲁迅所言，小说是从古代和现代取材写就，那么在其翻译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之后到1922年11月《补天》完成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与鲁迅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人或物”莫过于发生在1922年的《新青年》杂志停刊以及《新青年》阵营解体事件。之所以称其为影响巨大，可从鲁迅1922年12月3日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撰写的“自序”中看出来。这篇自序阐述了创作的初衷，同时也简要介绍了集子中小说的要旨。文中，鲁迅提到为《新青年》撰稿的始末，明确表达出“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并以自己的“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²⁶⁾ 这篇文章大致写于《新青年》杂志停刊后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鲁迅对本担当了新文化运动旗帜的主力刊物因为“性质”上的转变所引发的同人内部在办刊上的分歧，以及最终所导致的阵营分裂、

24) 鲁迅：〈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收入《鲁迅全集》第十卷，页221。

25)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页353。

26) 鲁迅：〈呐喊·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441。

刊物停办的结果流露出惋惜的情绪。直到十年以后，在《自选集》自序中，依然可以看出鲁迅对《新青年》解体的耿耿于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²⁷⁾

由此可见，虽然《新青年》并非鲁迅一手创办的刊物，但相比较其创办或参与办刊的《前哨》、《萌芽》、《奔流》、《语丝》等等，鲁迅倾注了别一样的情感在其中。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本杂志呢？笔者在此借用学者朱寿桐在为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所发表的论文之主题²⁸⁾ 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新青年》正好比鲁迅人生历程中的“思想故乡”。正是因为《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使得鲁迅从古碑的抄本中脱身出来，转而投向对旧社会病根的暴露的新文学创作。²⁹⁾ 可以说，“走出了故纸堆的鲁迅似乎正是《新青年》影响、召唤和改变的结果”。³⁰⁾ 尽管鲁迅之前也曾创作一些充满战斗气息，意在讨伐旧制度、促进国民性改造与提升国民认知的檄文，但从其对自己的文章进行编辑成书并出版的策略来看，他一直将加入《新青年》以后的创作作为自己定位于新文学创作者的立身之所在。³¹⁾ 而就作品的发表数量以及影响力而言，鲁迅在

27) 鲁迅：〈自选集·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页453。

28) 朱寿桐：〈作为鲁迅“思想故乡”的《新青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页27-40。

29) 鲁迅：〈呐喊·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440。

30) 朱寿桐：〈作为鲁迅“思想故乡”的《新青年》〉，页28。

31) 朱寿桐先生对此曾论述说：“首次结集出版的杂文集题为‘热风’，收录的多是《新青年》时代的文章；《新青年》以前的作品则嗣后才整理出来，并被溢以‘坟’的题名。他在多次的表述中将自己思想和文学的起点置于《新青年》召唤和影响之后，谈到‘我怎么做起

《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54篇之多，除了反映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历史的小说《狂人日记》外，《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也陆续见刊。至于最为见长的杂文，在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至1920年12月第8卷第4号“随感录”栏目所刊登的103则杂文中，鲁迅个人就发表26篇。由此看来，《新青年》阵营解散后，鲁迅时常流露出失去战斗阵地的彷徨之情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新青年》对鲁迅的重要意义与本文所要讨论的《补天》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回归到小说本身，最初是收入1923年的《呐喊》小说集中，对于鲁迅所言的由于成仿吾“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而在《呐喊》再版时将这篇小说毫不犹豫地“删除”，³²⁾ 笔者不去考证这是否是鲁迅的一种托词。然而小说确实曾被《呐喊》收入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引发下文讨论的一条线索。由于《呐喊》第一版15篇小说（再版时因删去《补天》而只剩下14篇）中的4篇最初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余下的11篇也均创作于鲁迅成为《新青年》同人之后，使得笔者有理由推断《补天》在内容与《新青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那么，这一关联是如何通过隐喻式的文字体现出来呢？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分析 and 印证。

小说的开篇，女娲从梦中“忽然”醒来，这种状态，在鲁迅笔下被渲染以一种懵懂的氛围。恰如沉睡多时，依旧沉浸在温暖和风中的女娲，被“惊醒”后所面对的是一个色彩斑斓，泾渭分明的世界。然而，她却感悟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这种冥冥中觉醒的状态，促使女娲舒展身体，履行自己作为造物主

小说来’，不仅归结为‘《新青年》的编辑者’陈独秀的‘催促’，而且在‘为什么’做小说的问题上明确归结为‘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的影响，由写作此文的30年代初期从时间上推算起来，正是指《新青年》时代，又从他‘将‘启蒙主义’内容与‘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观念直接联系起来这一点看，所指的也正是《新青年》的影响。可见，《新青年》及其影响一直是鲁迅乐于承认的思想资源，《新青年》促使鲁迅由思想之‘坟’中毅然走出，蜕变为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见朱寿桐：〈作为鲁迅“思想故乡”的《新青年》〉，页29。

32) 鲁迅：〈呐喊·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页353。

的神圣职责，开始了上古时代的造人历程。这一段颇具铺叙性质的描写，在笔者看来，既有着总览全文的效应，同时也将鲁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融入到一种浪漫主义的氛围中。1910年代至1920年代期间的鲁迅，有的只是失望和颓唐。这在他的《自选集》自序中有所表露：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³³⁾

这段独白反映的正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上门约稿时鲁迅的心情。对于这本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旨在“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进步刊物，鲁迅的回应是迟疑的，个中原因自然如上所记。这种略带颓废色彩的情绪使得鲁迅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将精力投注于抄写古碑等旧纸堆中。直到钱玄同登门造访，才使得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做点文章，恰如一声呐喊，惊醒铁屋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既然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铁屋的希望。鲁迅与钱玄同的对话正应和了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泯灭的希望，因此决定为《新青年》撰稿，也便因此有了最初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³⁴⁾

这种如同女娲从梦中惊醒般顿悟式的觉醒，令鲁迅在随后的日子里以势如破竹的气势奋笔疾书，其多年累积的思想之大成在《新青年》这块新生的肥沃土壤上播种下了为针砭中国社会时弊以及改造国民性而孕育的良种。除了前文提到的几篇小说外，备受关注的尤属其杂文创作：发表于《新青年》后收入《热风》中的“随感录”。而尤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在重读“随感录”杂文的前提下翻回《补天》的情节，竟然会寻得一一应之。

女娲醒来以后，为人世间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所环绕。根据历史传说记载，这位女神虽然处于一个美妙多彩的世界中，却感到一种茫然不知所终的寂

33) 鲁迅，〈自选集·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页452。

34) 鲁迅，〈呐喊·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441。

寥。于是，她用泥巴和水混合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外形捏造泥人，只几下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人在手中。而让女娲倍感欣慰的是，这些泥人可以开口说话，充满鲜灵的智慧。于是女娲不断捏造泥人，随着泥人的不断落世，他们也一个个地离开去大千世界中谋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即便是女神也有劳累的时候，随着造人时间越来越长，女娲逐渐感到疲累不堪，腰酸腿疼。她开始感到烦躁，也不再继续认真地一个一个捏，而是随手拿起一根紫色的长藤，蘸着泥水向地上甩动。泥点落在地上，变成一个个个人形。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是，这些泥人大多呆头呆脑，獐头鼠目，惹人厌烦。此时的女娲对于造人之事已经不再尽心尽力，而是仅仅当成一种夹杂着恶作剧心态的乐趣。她不再理会所造之人是否可爱，是否有力量生存于世界之中，她只是拼命地甩动紫藤，甩出无数低质的泥人。

从表面上来看，鲁迅对女娲造人的撰写基本上符合传说中的记叙。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语言上使用新文学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外，掺入了对女娲两次造人过程的好恶情感。很明显，鲁迅对女娲第二次造人表露出负面的情绪，这是作者自行加入的价值判断。因为在原始传说中，女娲由于造人速度过慢而拿起藤蔓，所造之人前后如出一辙地令人感到欢喜。但小说中的女娲却是因为焦躁和不如意，才带着恶作剧的散漫心理以藤条蘸泥水，造出的小人也不如先前的可爱。

笔者认为，鲁迅在此回应的是对当时中国人普遍在传统“多子多福”旧观念影响下，无论穷富，只生不养的陋习。在鲁迅的思想中，他一向是将孩子以及青年作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无论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还是提出“我们如何做父亲”的深省，都可看出他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新的总会战胜旧的。由此便可以理解，当他看到严又陵有关北京孩童在街上辗转于车马之间的危险情状所发表的议论时，也在“随感录”专栏上写下自己的感慨：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

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³⁵⁾

这无疑是对国家未来、民族前景的一种近似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感表达。从主题上来看，生子又是一件何等不起眼的小事。尽管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自言《随感录》“所评论多是小问题”，“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³⁶⁾但熟知鲁迅文风的人却能一目了然地理解这种谦辞背后，对千疮百孔的现实社会沉静兼带理性的凝视。而这也不能不说是自《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后鲁迅对“立人”思想的再一次陈述。

从整体内容上来看，鲁迅在“随感录”中的文章主题涉猎甚广，照其所言，“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³⁷⁾这些都是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鲁迅却能通过犀利的笔锋一矢中的地刺入问题的要害，将其内部顽瘤与病态的根源进行解剖，从而进入国民精神与民族灵魂的深层地带。而许多论者在研究鲁迅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时，都无可避免地会论及其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在《随感录三十三》中，鲁迅写道：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

35) 鲁迅，〈随感录二十五〉，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11-312。

36) 鲁迅，〈热风·题记〉，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07。

37) 鲁迅，〈热风·题记〉，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07。

傅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³⁸⁾

在《随感录三十八》中,鲁迅也再次论及: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又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德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³⁹⁾

鲁迅对儒释等思想的态度暂且搁置一旁,单就道家思想而言,他的批判态度坚定而又鲜明。这种态度影射在《补天》中,化为了女媧于激流的漩涡中遇见一群脸上长着白毛,自称学仙的“东西”的情节。她于山崩地裂之中醒来,感受到水和沙石从她的头上与身边滚泼过去。待到坐稳了身子,细看周围的情状时,她发现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已经不似那般可爱,相反地,他们因为大水的冲击,吐得满地狼籍,看上去还有些“怪模怪样”。他们祈求女媧的帮助,称呼女媧为修炼得道的“上真”,叫嚷的嘈杂声加上各种异样的举动,使得女媧颇为心烦。最后只能嘱咐巨鳌将山驮走,拉到平稳的地带去。

在这一段情节中,鲁迅既描绘了学仙道人、巨鳌等道家的标志性图像,也突出了“学仙”、“坏劫”、“上真”、“仙药”等道家常用术语,更是通过女媧的烦躁心情表露出自己对于道家的反对态度。鲁迅在整篇《补天》中从未称女媧所造之“物”为“人”,而是一直称其为“东西”,尽管传说中的女媧流传千古的功绩之一便是“造人”。当这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的时候,连创造了他的女媧都觉得“实在也没有工夫”来救他的命。鲁迅如此设计,使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他看来那些荼毒中国社会和蒙蔽国民大众的道家文化及其代表者,死亡是必然的结局。

然而,像鲁迅这样清醒的思想者和社会时弊的观察家毕竟是少数,那些反

38) 鲁迅,〈随感录三十三〉,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17-318。

39)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29。

对进步改革的保守派人物，仍然不断以“保存国粹”的名义大肆进行鼓吹，企图维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这对于一贯倡导破旧立新的鲁迅而言，实在是一件无可容忍之事。在《随感录三十五》中，他反问道：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如何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⁴⁰⁾

通观中国历史，既有举世瞩目的发明创造，同时也不乏貽笑大方，令有识之士侧目的陈规陋习，比如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忠义之士的鲜血被做成药引等等荒谬事情。前者固然可称为中国的“国粹”，但后者却是貽害国家民族的根苗。如果这也可称为是“国粹”的话，那却是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进步与现代化，反而会让这个国家背离历史发展的正轨从而变得越来越落后。

举例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道家文化外，“新文化运动”意在废除拗口晦涩的旧式文言也是一例。1918年初，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以《文学革新申义》为主题的文章，第一次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评。同年3月，在第4卷第3期的《新青年》上，又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撰写的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的“双簧信”。在揭露了“桐城派”、“文选派”等的复古论调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辩驳和批判。自此，《新青年》阵营与“复古派”之间的论战正式拉开帷幕。到了高潮时期，复古派文人陈拾遗出版旨在维护封建“国粹”的《文艺丛报》，扬言“今则新体竞尚，吸欧糟而吹美粕，与国粹为大敌，贸然欲推翻之。”林纾也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一文，鼓吹“无古文安有白话”的论调。对此，《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毫不示弱，对“复古派”的谬论奋起反击。李大

40) 鲁迅，〈随感录三十五〉，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21-322。

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的《林纾的留声机》，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孔乙己〉篇末附记》等文章都是这一时期反响强烈的檄文。在《随感录五十七》中，鲁迅对“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等怪状进行了批判：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⁴¹⁾

因此在《补天》中，女娲遇见的“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东西就有了耐人寻味的寓意。“东西”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形式与女娲的问话截然不同，“呜呼，天降丧。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殒落。呜呼，是实惟。”等使用的是当时备受进步文人批判的文言文形式，而女娲“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使用的正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简明易懂的白话文形式。如此看来，连女娲这位创造了人类的女神都无法理解的话语，难道还指望世间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能够恰当的运用吗？而这样一种繁杂晦涩的语言形式不也正是“文学革命”应当毫不犹豫革除的对象？但现实中，总有一些抱守残缺不放的所谓“国粹”守卫者，面对改革只知喊些“人心不古”的论调，就像那些操着文言文词汇的“东西”，只是重复地在喊着“人心不古”。对此，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八》中写道：

41) 鲁迅，〈随感录五十七〉，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66。

“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Vedda族。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为‘羲皇上人’。

但听说他们的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⁴²⁾

这是一种近乎沉痛的预言，锡兰岛Vedda族的人民，正是因为拒绝改革，拒绝变化，虽然没有受到别民族的干扰，保存了本民族的现状，却也扼杀了进步的希望和可能。其结果就是人口在逐渐减少，濒临灭绝。如果中国社会也像Vedda族一样拒绝改革的话，后果只能如出一辙：积贫积弱，最后亡国灭种。

道理虽然如此，但能像鲁迅这样看透的人却不多。事实上，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国民依然保留着沿袭传统的行为准则，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祖训、习俗与社会约定俗成的制度如何说，他们便人云亦云地照着做。价值上的是非判断取决于古制，而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变常新。因此在小说中，女媧本以为那些围着破布片的“东西”应该可以探出一些问题的头绪，哪知他们不过是将女媧的问题再重复一遍，丝毫不见有想要回答的意图：

“那时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怎么一回事呵。’他略一抬头，说。

‘那刚才闹出来的是？……’

‘那刚才闹出来的么？’

‘是打仗罢？’伊没有法，只好自己来猜测了。

‘打仗罢？’然而他也问。”

这完全就是一台留声机，而将这台留声机放置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大环境

42) 鲁迅，〈随感录五十八〉，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68-369。

下，却也发现它竟衍生出无数相似的模型。鲁迅曾经思考为何会出现缺少创新，缺少改革的氛围，终于发现国民担忧自身处境的背后依然是长久以来流传的观念中的违背传统便是“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的思想在作祟。他在《随感录四十一》中说：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⁴³⁾

从明末开始，中国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随之磨灭的还有国民性中的丰富创造力与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宏大气量。这种情状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陷入了无可救药的落后境地，也使得这个曾经在世界史上辉煌一时的东方神秘国度如同破裂了的“天”一般开始了备受欺难的苦旅。小说中的描写可以说是现实的反映：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齷齪破烂的地，丝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虽然女娲想要补天，想让天恢复到原来的模样，恰如鲁迅及其同人想要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使社会恢复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鼎盛时代，然而女娲看见的是“冷笑，痛骂”，还有人为了阻止女娲补天抢走她手中的石头，甚至于咬她的手，而现实中的鲁迅与《新青年》同人遇到的也正是保守势力的针锋相对和不怀好意的挑衅。

那么这些抢走女娲手中石头，阻碍她补天的人到底是谁呢？小说中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可以推知在女娲造人之前，盘古开天辟地后留下的混沌世界中只有女娲一个人，因此，这些与女娲作对的“东西”应当是她自己所造之泥人无疑了。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这群东西或学仙，或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或对女娲补天添烦加乱，总之没有一个在做“正经事”。当女娲累到快要支撑不住

43) 鲁迅，〈随感录四十一〉，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40。

的时候，又有一个小东西用一条光滑的青竹片刺女娲的脚趾。在女娲低头看时，只见竹片上有两行比树叶上的黑斑还要小的黑色细点。她在赞叹手段细巧的同时，也好奇黑点表示的含义。于是那东西倒背如流地说：“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

这又是一段复杂拗口的文言文，奇妙的是，当它们以“微观雕刻”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更是具有了几分艺术的色彩。然而，这种艺术性却在本质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多了固守旧俗，甚至玩世不恭的意味。鲁迅借用这一片段的描写，实际上讽刺了当时的一些旧式文人，在《随感录四十七》中，他曾经描写了一类“艺术家”：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功夫呢？”⁴⁴⁾

显微镜本用于医学与生物领域，目的是观察形态微小生物的内部构造和变化情况。但传入中国后，非但没有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变成了一些人用以制作消遣用具的辅助性工具。显微镜自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纵观中国，将那些先进的发明用在荒谬的途径比比皆是：造纸术的改进只是为了宣传中国古代的封建思想学说；指南针变成了驱除鬼怪和看风水的工具；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来防御外敌的侵略，而中国却为的是给皇族放烟火；外国人用鸦片来医病救人，但到了中国却变成了麻痹精神，以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祸害。中西方的差异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能够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只能是进行改革。

因此，笔者以为，鲁迅在小说中借用女娲补天的传说，叙写他理想中的社会改革。尽管女娲在点火时，最初火势并不旺，但最终还是喷发出无数火焰的舌头来。随后火势渐猛，赫赫的压倒了昆仑山上的红光。最后，大火烘托了女

44) 鲁迅，〈随感录四十七〉，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51。

娲的身躯，使宇宙间显出了最后的肉红色，而补天的壮举也在这一刻完成。在鲁迅的想象中，改革必然是曲折的，但最终将产生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而中国社会破裂的“天”也终究会为改革所修补。

补天之后，女娲终于因为劳累躺倒在地，不再呼吸。笔者认为，鲁迅对女娲之死的叙写有两层隐喻。一则鲁迅撰写《补天》时，《新青年》杂志已经停刊，同人已经解散。这本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在它存在的几年里，宣传了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到了1917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又开始向中国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从它存在时间的相对之长以及刊物内容的相对丰富性、与时代的契合性而言，《新青年》在当时都是一本相当成功的刊物。因此，对于它的停刊，鲁迅是带有遗憾与惋惜的情绪的。二则鲁迅借女娲之口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态度：养回了力气，再来罢。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死”，或者说《新青年》的停刊又是怀有希望的：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着，经历了涅槃的凤凰才会浴火重生。正如《随感录六十六》中所写：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褻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⁴⁵⁾

死亡并非是一件寂寞悲哀的事情，后继的生命将会在死去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踏出新的路。这种周而复始的观点再一次突显了鲁迅一以贯之的进化

45) 鲁迅，〈随感录六十六〉，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86。

论思想。

小说的结尾，鲁迅在传说的基础上为女娲死后编写了“衍文”：一群禁军终于杀到，他们本来是来讨伐女娲的，但是由于等候时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等信号，所以到得迟。他们胆战心惊地攻到女娲身边，大概还斗胆用斧戟在女娲的尸体上戳了戳，确信她确实是死了才敢彻底靠前，在女娲肚皮上扎了寨。最令人感到滑稽也是最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本是女娲的敌人，现在却转了口风，自称是女娲唯一的嫡系。因为女娲造人、补天，已经成为众所崇拜供奉的女神，颇得民心，因此作为女娲的嫡派，必定会得到女神的荫庇。在适当的时机以这位女神作为炫耀的资本，夸示于人，正如选择女娲身上最膏腴的部位，获取利益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鲁迅将这种嘴脸形容为“合群的自大”或者说是“爱国的自大”：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⁴⁶⁾

这些人表面上是勇猛，实际上却是卑怯的表现。在鲁迅看来，就是“复古”、“尊王”、“扶清灭洋”，正是他们的存在，应和了那些反对改革者的心意，或者说这一些人中，不少本身就是反对改变和创新的封建卫道士。因此，虽然中国经历了各种革命，已经推翻满清进入民国时代，却依然还有“吸尽了少年空气”的“老”人。就像散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在临死之时将仙山被巨鳖背到海上的“要闻”传授给徒弟，后来传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耳朵里，一代代的皇帝都在寻觅着长生不死的仙方，却始终无果。他们不肯老去，不肯死亡，宁愿自己垂垂老矣，行动不便，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总之“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在

46)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27。

《随感录四十九》中，鲁迅称其为“生物界的怪现象”：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进，原也是极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终于今个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⁴⁷⁾

以新的代替旧的，年轻的代替年老的，这是鲁迅一贯主张的进化论的主要内容，只有新陈代谢机制的顺利进行，种族才能够延长，生命才能够延续，社会才能够进步，国家才能够发展。否则的话，中国非但不能摆脱内忧外患，只能是再增加若干“野蛮岛”。这正是《随感录四十二》中一个英国教会医生对中国人的称呼：

“听得朋友说，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称中国人为土人；我当初颇不舒服，子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⁴⁸⁾

至此，小说结束于鲁迅对社会现实既有透彻的分析，又有沉重的预言当中。

47) 鲁迅，〈随感录四十九〉，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54。

48) 鲁迅，〈随感录四十二〉，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页343。

三、结论

《补天》是《故事新编》的首篇，也是鲁迅第一次尝试对历史题材进行改写而成的小说。以往对其乃至整部《故事新编》的分析与评价，大致都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进行，或分析作者如何对历史神话进行改写，或评论这一创作手法对文学界的影响。同时，由于《故事新编》本身在影响力上不及鲁迅的其他两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因此对其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停滞现象，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一处缺憾。

整体来看，《补天》在叙述上沿袭了历史传说的主干内容。但在细节方面，相较于上古文言的晦涩与文字语义方面显露出的刁钻，鲁迅的重写显得平铺直叙与浅显易懂。这一方面自然是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干将在文学创作实践上的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寓深刻于浅白之中的手法却也恰恰印证鲁迅在把玩拿捏文字方面的独到与娴熟。进而言之，这一点实可作为分析其“油滑”笔触的佐证。

通过对《补天》的重读，笔者发现，作者言后另有他物。小说的情节与鲁迅在《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撰写的若干篇杂文在内容上有镜像式的一一呼应之处。作者以女娲的传说为叙事主线，将当时中国社会时弊统揽于“开天辟地”这样一个有着时代变革，风起云涌特点的大背景中。同时，他将中国人多子而不教、求仙、保守“国粹”、滥用科学等谬行杂糅进女娲造人、女娲补天故事的情节之中，并加以改编。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在一九二二年创作这篇小说呢？笔者在文中也作出了相关的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实际上秉承了鲁迅一以贯之的“立人”和“新必胜旧”的进化论思想。这是在一些论者的论文中已经被提出的观点。不过笔者与前人论述上的不同之处在于，既有研究资料多从女娲造人本身这样一个“创世纪”神话出发，讨论的内容也仅限于神话本身。而笔者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关注于文本对现实的反映，这是本文的贡献所在。因为在笔者看来，如果认为鲁迅的小说仅仅是一则单纯的寓言未免有失对这位文坛巨人长久以来试图以文救人，进而救国的宏大抱负的理解和尊重。

进而言之，小说真正的写作目的，实际上是有感于《新青年》杂志的停刊以及同人阵营的分裂，作家因此创作此文，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惋惜与遗憾之情。

事实上，对《补天》内涵的思考应当放置在整部《故事新编》的框架中。以古写今的叙述方式并非《补天》独有。在笔者目前已经发表的另外两篇关于《故事新编》的论文中，《理水》实际上叙写了1928年至1929年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论争，以及1930年鲁迅加入“左联”的始末。⁴⁹⁾ 而《出关》则是借助老子的形象，将“左联”自1930年成立后，鲁迅与以周扬为首的对立派别之间的纷争以暗喻的方式进行回顾。⁵⁰⁾ 至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小说是否同样应用了借古喻今的手法，笔者目前未作考证，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相关研究中有所突破。不过，这也许能够为解释《补天》由《呐喊》被收入《故事新编》的原因提供一个理由，即鲁迅将具有类似书写性质的小说归纳入集，构成一部反映其现实人生经历的历史文本。

49) 见拙文〈《理水》与鲁迅加入“左联”始末〉，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13辑，2010年12月，页49-70。

50) 见拙文〈纪实与虚构——《出关》对鲁迅与“左联”派别纷争的影射〉，载《中国现代文学》，第57号，2011年6月，页95-120。

参考文献

- 1、 蔡婷：〈女性神话的书写——《补天》女性意识解读〉，载《语文学刊》，2009年第10期。
- 2、 董学文、张首映：〈从无意识到泛性论——弗洛伊德文艺观述评〉，载《文艺论与批评》，1986年第10期。
- 3、 甘智钢：〈神话与鲁迅小说——《补天》重读札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 4、 何希凡：〈现代文化创造者忧思和豪兴的二重奏——鲁迅《补天》和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的情感内涵比较〉，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 5、 林非：〈历史小说的开拓者——论《补天》及其他〉，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 6、 鲁迅：〈呐喊·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以下所引用鲁迅文章皆来自这一版本。
- 7、 鲁迅，〈热风·题记〉，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8、 鲁迅，〈随感录二十五〉，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9、 鲁迅，〈随感录三十三〉，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0、 鲁迅，〈随感录三十五〉，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1、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2、 鲁迅，〈随感录四十一〉，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3、 鲁迅，〈随感录四十二〉，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4、 鲁迅，〈随感录四十七〉，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5、 鲁迅，〈随感录四十九〉，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6、 鲁迅，〈随感录五十七〉，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7、 鲁迅，〈随感录五十八〉，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8、 鲁迅，〈随感录六十六〉，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 19、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 20、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 21、鲁迅：〈自选集·自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
- 2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
- 23、鲁迅：〈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收入《鲁迅全集》第十卷。
- 24、陆耀东、唐达晖：〈《补天》与弗洛伊德学说〉，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 25、秦林芳：〈“无聊”与创造——《补天》新论〉，载《名作欣赏》第6期，2000年11月。
- 26、邵建：《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秀威资讯，2008年版。
- 27、谭杰：〈女媧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2月。
- 28、王富仁：〈创造者的苦闷的象征——析《补天》〉，辑于《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 29、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载《鲁迅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30、吴立昌：《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
- 31、吴颖：〈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3期。
- 32、闫宁：〈《补天》新解——民俗婚恋图腾关照下的女媧形象〉，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 33、余风高：〈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印象〉，载《鲁迅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34、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35、朱寿桐：〈作为鲁迅“思想故乡”的《新青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 36、邹宇欣：〈《理水》与鲁迅加入“左联”始末〉，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13辑，2010年12月。

- 37、邹宇欣：〈纪实与虚构——《出关》对鲁迅与“左联”派别纷争的影射〉，载《中国现代文学》，第57号，2011年6月。

<Abstract>

Rewriting the Old Materials
: Why Lu Xun Created *Mending the Heaven*

Zou, Yuxin

As the first piece of *Old Tales Retold*, 'Mending the Heaven' is Lu Xu's first work trying to rewrite the historical issues. It is obviously, through reading the text,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echoes some of the columns published in 'Sui Gan Lu' in *New Youth*. Using the tales of Nv Wa as the narrative theme, Lu Xu put the ol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and revolution era with a metaphor method. Meanwhile, he criticized the bad habits of Chinese, such as bearing children without educating them, the ritual of looking for the God, sticking to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busing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retelling the story of Nv Wa's creating the human being and mending the sk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reason Lu Xun wrote 'Mending the Heaven' in 1922 is to show his regret feeling to the ceasing of *New Youth* and the splitt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camp.

Key Words : Mending the Heaven, Lu Xun, *New Youth*, Sui Gan Lu

투 고 일 : 2012. 8. 30. / 심 사 일 : 2012. 9. 19. ~ 2012. 10. 7. / 게재확정일 : 2012. 10. 10.